

电子媒介时代语境下新诗发展的前景

王 澜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21世纪初,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走到了十字路口,随着以网络为主的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新诗的发展举步维艰,有人甚而断言新诗将成为我国最先消亡的文学种类。笔者以为,新诗“消亡”论者未意识到,新电子媒介的兴起也给中国新诗带来了新的机遇,使得新诗的发展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媒体诗歌——网络诗歌、短信诗歌在新兴的电子媒介(网络和短信)上繁盛的事实,电子媒介时代语境下诗歌与图像之间“和而不同”的共生互补关系,都说明了新诗不仅不会消亡,而且面临新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电子媒介时代;新媒体诗;网络;图像;前景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7)05-0025-04

中国新诗至今已走过近百年的发展历程。虽曾几度风雨,但也历经辉煌。但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家社会经济体制开始转型,使得中国文化走向转型时代,作为中国文化与诗歌在20世纪现代转型的排头兵和急先锋,新诗的发展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1]。面对传统新诗读者锐减、诗集和诗刊销量下跌等现象,有人认为新诗发展陷入了低迷凄凉、失意彷徨、无人喝彩的落寞境遇之中。而且雪上加霜的是,本世纪伊始,从西方文艺理论界刮来一股强劲的“文学终结论”飓风^[2],对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惊魂未定的中国文坛又形成了新一轮的冲击和震动。这种“文学终结论”认为,随着以网络、影像为主的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图像不断增值,文字不断减值,于是新的读图时代和图像社会逐渐形成^[3]。在这种新型社会文化语境中,图像对于文学形成无情遮蔽和强力挤压,致使后者的生存空间和活动领地逐步缩小,直至最后“终结”。而国内学界部分学者据此生发,悲观地提出了“文学消亡”论,而由于新诗当下的尴尬处境,更由于它与图像的尖锐“对立”——诗歌与叙事类文学相比更难实现图像化,因此新诗与图像社会似乎显得格格不入、不合时宜,所以有人据此断言,新诗将成为我国最先消亡的文学种类^[4]。

新诗会消亡吗?笔者以为这是杞人忧天,无稽之

谈。所谓“消亡”云云,只是一个假象或者说是一个伪命题。何也?毋庸讳言,目前,虽然当下部分印刷媒介诗歌由于有明显的“学院派”、“小众化”倾向而与普通大众读者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另一方面,或许新诗“消亡”论者尚未清醒地意识到的是,自上世纪末以来,以网络为主潮的新兴电子媒介的兴起,也给中国新诗带来了新的机遇,使得新诗的发展发生了新的变化。网络媒体(包括电脑网络和手机短信)相对于印刷媒体凸现出自由性、民间性和狂欢性等特征,使得诗歌迅速地由传统纸质媒介向新兴网络媒介延伸、扩张和转移,并迅速生长。

以网络为载体而发表与传播的网络诗歌,正在成为中国当代新诗的新形态。从1999年1月国内第一家网上诗刊出现在“重庆诗歌”站的《界限》上以后,网络诗歌便如雨后春笋一般大量涌现。一些较有影响的诗歌网站,还有上海小鱼儿的《诗歌报》,河南安阳石破天的《诗先锋》,福建厦门李可的《中国诗人》,陕西西安伊沙的《唐》,北京周瓛的《翼》,北京沈浩波、南人的《诗江湖》,北京安琪、谯达摩等人的《第三条道路》,广东深圳七星宝剑的《中华诗歌网》等等,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网络诗歌网站已有500多家。发表的网络诗歌不计其数,仅以“我看看中文网”为例,该网自2000年8月创办以来,其诗歌创作园地发表的现代诗歌作品已经超过了1900页,总计超过15000首^[5]。

* 收稿日期:2007-06-01

作者简介:王澜(1971-),男,湖南邵阳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同时,近几年全国许多知名诗歌刊物(如《星星》)、电视台(如中央电视台)、公司企业(如中国移动)纷纷举办短信诗歌活动和比赛,其空前的盛况以及大量涌现的原創佳作是诗歌在手机短信这一新兴电子媒介载体上大发展、大流行的表现^[6]。例如,国内知名企业中国移动通信公司从2004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连续举办了三届手机诗歌大赛,从比赛的总体情况来看,“手机诗歌异军突起”,“诗歌作者最活跃,为沉寂的诗坛注入了活力”;而2006年3月,中国移动e拇指诗歌网(www.emz.com.cn)提出“手机阅读”新概念,并与天涯杂志社、天涯社区共同联手《人民诗歌》、《星星》诗刊等诗歌期刊,推出“第三届e拇指手机诗歌原创争霸赛”,参赛者踊跃,“其中手机诗歌创作最活跃最有质量。手机这一强势媒体以咄咄逼人的态势,迅速引领诗歌创作的新潮流”,“手机诗歌时代已经来临”^[7]。而从学理上讲,手机短信特别有利于诗歌的生产、流通与传播,并在事实上促成了特定诗体的再度勃兴和创作的高度繁荣。

以网络和手机为媒介发表与传播的新媒体诗歌,由于其生产快速、发表低门槛,使得诗歌借助网络(包括手机)的平台而走出低迷状态,重现创作热潮,已经成为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诗坛的大事,正如诗人伊沙所说:新媒体诗歌“确已构成世纪之交最具新鲜亮点的一大风景”^[8]。因此,新电子媒介的发达,新媒体诗歌的如期出现与勃兴,足以证明新诗消亡论的荒谬。正如吕进所言,“网络给诗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网络诗歌的出现,以“它向社会大众的进军”改变着当代诗歌的形态^[9],具有诗歌史的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认为网络(包括手机)无限敞开的空间、自由自在的发表方式和交流方式以及迅捷便利的传播特性,给中国新诗的发展重新注入了活力与增长素。网络(包括手机)与诗歌的联姻,使得新诗重新走向了民间,走向了普通大众,并发生了适应普通大众读者的新变化。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指出,印刷媒介有利于形成社会场景之间的隔离,从而促成知识的垄断和权威的得势。随着印刷媒体和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的深入和细化,印刷传媒日益成为知识精英们的专属领地,普通文化大众难以涉足,并不得擅入^[10]¹⁰⁵。这样,印刷媒介就自然而然地沦为知识精英们施行权威和享受特权的权力场域,而印刷媒介载体上的传统新诗文本就是这种权力运作的产物。由于印刷传媒的垄断性和权威性等特点,致使任何欲进入这一传媒形态场域的诗歌文本必须迎合掌控话语权力的权力主体(知识精英)的审美期待、美学

标准与范式,必须接受其审美格式化改造,必须符合其精英化的审美趣味,否则难于发表。这样,大量大众文化诗歌文本以及民间文化诗歌文本因其难以满足或不愿满足印刷媒介权力主体的审美偏好而被拒斥在印刷媒介场域和空间之外。印刷媒介日益强化的精英美学立场和抵制大众文化的姿态直接影响了中国新诗的进一步发展。

而肇始和生成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新兴传媒——电脑网络与手机短信,则为民间大众实现自身的大众化诗歌理想与审美诉求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梅罗维茨也认为,电子媒介与印刷媒介相左,它“倾向于打破隔离,融合社会场景,从而模糊角色,消解权威”^[10]¹⁰⁷。

因此,作为一个推进文化生产、传播与交流的文化公共空间和文化平台,由于其独有的“零门槛”和“去中心性”等特性,电子媒介透显出鲜明的狂欢化和后现代特质:无等级性、宣泄性、颠覆性和大众性。在这样一个文化生产场中,文化精英们建构文化霸权的企图遭遇重创,他们那种具有一体化的、高度霸权性质的权威和那些被“赋魅”的、具有神圣和神秘色彩的文化产品被彻底解构和“祛魅”。因此,新兴媒介与诗歌的结合,不啻是一次简单的诗歌传播载体的更新改变,不是所谓的“新瓶装旧酒”,而是一场深刻意义的革命,其更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以新媒体为契机,真正将诗歌创作、发布、传播与评判的话语权归还给最广大的民间,体现出一种绝对真实和纯粹的民间性。新媒体的泛众性和“去中心性”的回归,将诗歌精英们集中垄断的话语权平均而平等地分配给广大的新媒体诗歌参与者,每一个成员都可真实而平等地发出自己的个性化声音。这种民间的、原生态的诗歌多样性环境接受各种体式、各种风格的创作,提供了诗歌自然生长的土壤,每个诗歌文本都拥有了自己的话语声音,都获得了生存的权力。

为真正回归民间,走向大众,我们看到新媒体诗歌有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特征。首先,新媒体诗歌打破了作者(诗人)与读者的绝对界限。诗歌作品本来的循环形式是作者—作品—读者—作品—作者,整个循环形式是开放式的,即作者与读者有着相互沟通的关系,然而,印刷媒体阻碍了这一循环方式,原因是有了一个编辑(报刊媒体版本的体现者)。作品过不了编辑的关,就无法与读者见面,再加上报刊媒体如版面、栏目要求等限制,所以造就了少数作者(诗人)与无数的读者,诗歌走向了自闭性,曲高和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歌的发展,新媒体诗歌更具有自由性、开放性,大众性,特别是BBS、MUN、“留言板”、“论坛”,

网友可以以作者(诗人)的身份自由地贴上相关的文章,也可以以读者的身份来评论别人的文章,网络上的作品任何人都可以读,这彻底打破了作者(诗人)与读者的绝对区别。网络诗歌的对话方式是作者(诗人)与读者的直接对话,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空间中,诗歌轻易绕开了印刷媒体的编辑角色,绕开了“守门人”(Gate Keeper),而直接呈现在读者大众面前。“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真正体现了网络诗歌的民间性和大众性。其次,新媒体诗歌改变了诗歌文本自身的表达手段。传统的诗歌文本一经写定,就成了一个自足的个体,有稳定的叙述结构,虽然它存在的意义也有赖于读者的参与(欣赏)和再创造。新媒体诗歌打破了传统诗歌文本的这种A—B—C—D的直线式、顺序式叙述结构,以非线性结构形式使作者(诗人)可以从一个事物的叙述过程无限地与其他事物相“链接”,从而创作出不同的文本。也使得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读到不同的内容,甚至将自己的创作加入其中,形成新的文本方向,真正实现作者、读者交流的一体化。网络诗歌成为集体创作、集体修改,不断变化,永无定型。这些新变化,也正好说明新诗在新媒介语境下继续葆有鲜活的生命力。

—

影视、网络等新电子媒介制造的大量“仿像”(simulacrum),使得人们进入一个海德格尔所预言的“世界被把握为图像”^[11]的时代。

笔者以为,在这个“读图时代”,虽然图像在不断地四处蔓延和扩张,作为纯文学的诗歌的疆域被不断地侵占,诗歌的边界在不断地退缩,但二者的内在特质决定了它们之间最终不是吞噬与替代的关系,而是共生和互补的关系。首先,从艺术表现与审美的维度来看,二者呈现出迥异的特点。与图像的外在可视(听)性、物质化、感官化不同,诗歌是一种内视性的、非物质化的艺术形态。相对于图像文本及其审美的单一化和浅表化倾向,诗歌文本及其审美具有丰富性和深刻性特征。读者对于诗歌的审美必须通过语言文字、借助审美想象而进行和实现。审美主体通过想象重塑的艺术形象以及重构的艺术世界是内在于主体的精神世界中的,它具有内在可视性和非实体性的特点。因而它无法与图像等感官化的艺术一样被人的视听感官所感知——这样,对于两种具有完全相异的审美感知方式和美学呈现形态特点的艺术,以所谓物质化、感官化的图像取代虚拟性、想象性的诗歌就只能是一种假想。诗歌创造的是一种内视化的世界。这个世界看起来由语词符号组成,其实它只能由每一

个读者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创造出来。它就像梦境,像幻觉,像我们内心深处的回忆与想象,是一个无法外现为物质性的视听世界的所在。就此而言,即使读者有心用某种艺术样式或某种生理性的感性满足来取代诗歌所提供的审美世界,它作为一个永远不可能为感官所感知的精神性的存在,却不能被取代。其次,在当代图像社会,虽然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类别能一定程度地被图像化——被改编为电视剧或电影作品,但作为主情的文学艺术的诗歌却极难被图像(电视或电影)“招安”与“收编”:诗歌不像叙事文类那样具有人物、故事、情节等适合电视、电影等改编的要素和构件,它主要抒发和表现情感主体的非具象情愫,同时在表述上往往具有非逻辑性、跳跃性等特点,而且一般形式短小——这些都使得诗歌的图像化几乎不可能。另一方面,从更深层次看,诗歌是语言的艺术,电影电视等是图像的艺术,由于各自所使用媒介的属性的根本差异,以及诗歌在语言艺术中的文体独特性等,也使得诗歌向图像的转化困难重重。众所周知,画面是电影、电视语言的基本元素,“电影的存在是由于画面的不可替代的必要性,由于电影的视觉特性绝对要比电影作为思想或诗歌容器的性质更为重要”^[12],因此,电影艺术要求所表现的一切对象和客体都能够而且必须转化为可视形象和具象画面,这从而也使得图像文本的审美表达和审美意蕴呈现出单一化和浅表化的特征。而作为语言艺术之一的诗歌则是虚实结合、虚实相生的艺术结晶体。由于受篇幅、文体的限制,诗歌必须用高度概括、极其精炼的诗歌语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思想情感。而要实现和完成这一艺术目标,诗歌在一定程度写实的同时,必须更注重务虚——即以有限的文字包蕴和表达尽可能丰富的内涵。这样,诗歌往往追求语词的多义、复义甚至歧义,追求语义的张力和弹性,追求能指与所指的多重对称关系,以达到言近旨远、言少意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因此,相对于其他艺术种类的语言而言,诗歌语言存在着丰富深刻得多的信息。其语词在单纯的、表面的意义之外,还涵纳和融会了创作主体多元的、复指的、细微的审美想象、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以及流动和充溢于字里行间、由诗歌整体呈现出来并时不时从单个语词流露出来、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一般令人捉摸不定的“气韵”、“诗味”等等。这样,具有单一化、浅表化和直观性特征的图像在对亦实亦虚、亦真亦幻、具有丰富性、深刻性以及内视性等特征的诗歌进行图像化转换和改造时往往显得无能为力,一筹莫展。即使勉强为之,也只能以图像显现其皮相,而其

丰富的内蕴则在不同艺术语言的转化和“翻译”过程中大量耗损、流失掉了。

但是,诗歌的“抗拒图像化”特性并不会使诗歌消亡,相反,正因为它的这一反图像化特征,使得它不会被图像所取代和吞没,从而得以始终保持独立、昂扬的生长发育姿态,并与图像形成共生和互补的关系:作为以叙事为主的图像可以借助诗歌来表达和抒发更为丰富、更为深刻、更为细腻的情感,从而扩大图像的审美能指空间和拓深图像的人文精神底蕴,并使审美主体通过诗性的语言和想象相对深入地和准确地把握、体验审美客体(图像)的美感底蕴,并由此获得深度的审美感悟能力和内心生活的丰富性;另一方面,诗歌也可以借助具象化、可视性的图像更形象地彰显和表达自己的意义,引导和加深读者对诗歌的体悟和理解,并给受众以更直观、更丰富的审美冲击力。例如,在新电子媒介语境下的新媒体诗歌有的实现了单纯的文字文本向图文并茂、声音与文字并举、动漫与文字同行等多种文本创作与欣赏方式的转变,这些新诗不仅是读的诗歌,同时还可能是听的诗歌、看的诗歌。这种“超文本”的结构将把当代诗歌的写作和阅读带入一个全新的境域。因此,图像与诗歌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关系样态,它们互相独立,但又可互为裨益,互相促进,而不是一种吞噬与被吞噬的剑拔弩张的关系。

新诗在新兴的电子媒介文化传播载体(网络、短信)繁盛的事实,诗歌与图像之间“和而不同”的同生互补关系,都有力地证明了新诗不仅不会消亡,而且面临新的发展前景。但是,另一方面,学界还必须警醒和注意的是,虽然中国新诗不会消亡,并不等于说

我们就可以盲目乐观,可以对新诗目前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相反,为了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正视新诗的“似曾相识的危机”,积极进行新诗诗体重建,研究新诗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和当前多元文化传播媒介语境中的发展新策略,尊重诗歌发展规律,努力为诗歌发展创造更加有利条件,才能使新诗走出“消亡论”的阴影,走上健康、和谐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 [1] 陈剑:新诗发展的十字路口[G]//吕进,蒋登科.现代诗学的多维视野.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14.
- [2]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J].文学评论,2001(1):131-139.
- [3] 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7.
- [4] 高磊.该终结的“文学终结论”[J].文艺争鸣,2006(1):56-58.
- [5] 张阔.网络时代的诗歌风暴[EB/OL].http://www.xshdai.com,2006-04-06.
- [6] 葛红兵.拇指文化·短信诗歌[N].诗歌报,2003-07-18.
- [7] 《华西都市报》编辑部.诗歌乘着手机的翅膀[N].华西都市报,2006-08-08.
- [8] 伊沙.中国诗人的现场原声[G]//马铃警兄弟编选.中国网络诗典.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1-3.
- [9] 吕进.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130-135.
- [10] 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 [11]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M].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885-886.
- [12] 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221.

责任编辑 韩云波

The Prospect of Modern Poetry At the Time of Electronic Media

WANG L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21st century, Chinese new poetry come to a critical crossroad with the coming of internet dominant electronic media time which places new poetry in a dilemma. For this reason, some people even claim that modern poetry would be the first literature form to face extinction. The writer is however against the extinction view, pointing out that those people fail to realize the new opportunity for modern poetry in the electronic time. The flourishing of new media poetry including network poetry, message poetry on cell phone, combined with pictures, clearly shows that modern poetry will never die out but have a new prospect.

Key words: electronic media time; new media poetry; network; picture; prospect